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UANTI SHIGAO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1966~1976)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III

十年风雨

SHINIAN FENGYU

顾问：龚育之 李君如 石仲泉

策划：李正培 何志勇 解 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十年风雨
(1966~1976)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卷3, 十年风雨/郭德宏主
编.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4
ISBN 7-220-06676-7

I. 中... II. 郭... III. 中国-现代史-研究-
1966~1976 IV. 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1168 号

ZHONGHUARENMINGONGHEGUO ZHUANTI SHIGAO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卷三)

——十年风雨 (1966~1976)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周 颖 庄学君 何昌宇
何东琳工作室
杨 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661236 86650010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679239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所 (028-85910167)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21.5

插 页

6

字 数

519千

版 次

200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6676-7/K·968

定 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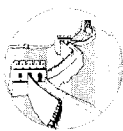
380.00元 (卷1~卷5)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郑 谦 (1)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再发动	安建设 (23)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卜伟华 (52)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卜伟华 (90)
全国范围的“夺权”运动	安建设 (119)
二月抗争及批判“二月逆流”	安建设 (150)
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	邓礼峰 (176)
刘少奇冤案始末	黄 峥 (209)
中共九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确立	金春明 (239)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	李丹慧 (268)
60年代末的战备高潮	郑 谦 (291)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运动	郑 谦 (312)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柳建辉 (332)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	周全华 (353)
林彪集团和林彪事件	于 南 王海光 (385)



70 年代初期的“三个突破”与调整	陈东林 (418)
1972 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安建设 (442)
中苏分裂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	李丹慧 (479)
中美关系的突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 的恢复	官 力 (501)
“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王海光 (531)
“学理论”和“评水浒”运动	王海光 (556)
1975 年的全面整顿	张 化 (586)
1976 年的“四五”运动	张 化 (61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李永丰 陈明显 (636)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翟亚柳 (662)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郑 谦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的抵制。在彭真主持下起草、并经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同意的《二月提纲》,试图对日益升级的学术批判活动加以限制,但却被认为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很快,《二月提纲》也受到批判。从对《海》剧的批判到《二月提纲》的发出,从对《二月提纲》的批判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自1957年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经过一系列量变,终于发生了一个全面的、质的飞跃。以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为标志,文化革命开始转变为一场政治大革命,尽管它还被





称作是“文化大革命”。

批判《海瑞罢官》的缘起

1965年2月，江青又一次来到上海。只是在十多年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江青此行，是为了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人们莫名其妙地或漫不经心地看着徐徐拉开的帷幕，谁也不曾料到，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剧”，竟是一场把偌大中国搅得沸沸扬扬，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使神州大地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深深创伤的政治动乱。

从1962年起，长期称病赋闲在家的江青不甘寂寞，开始“过问”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她一出马就不同凡响，一口咬定舞台上、银幕上大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因而当时文化领域里正在进行的、已经有些过头的批判已经不适应斗争的需要。但她很快就感到，要实现她的“抱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阻力很大”。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江青此次上海之行的目的有二：一是与张春桥一起插手修改京剧《林海雪原》（后改为《智取威虎山》）。其目的，是通过这出京剧来吹捧其时在东北工作的林彪，以便同林彪勾结起来，借这座“尊神”攫取更大的权力。

江青的另一个目的，是物色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选。江青1962年就提出要批判《海》剧，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她又私下先后在北京找了一两位文艺评论家去写，但也被婉言拒绝。这些都使她增加了对中央一些部门的仇视。

在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支持下，通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合适的人选很快物色到了，此人便是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姚文元。在江青、张春桥看来，姚文元是搞文艺评论的，以长于写批判味道十足的文艺评论文章而著称。此前不久在对周谷城先生的批判中，他声色俱厉、上纲上线的批判更是与众不同。

姚文元受领任务后，从3月初起，开始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着手写作。由于他对历史、特别是明史完全是门外汉，又找人提供明史和海瑞的有关资料。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张春桥又找了几个心腹参加讨论。讨论中，当有人提出文章第四部分将《海》剧中“退田”等问题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说法是不是太过分的时候了，张、姚都莫测高深地不置一词。

姚文元的文章刚一发表，一些有政治经验的人便感到它与当时许多批判文章的区别，因为它与60年代初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的联系十分明显。姚文十分荒谬地把写成于1960年的《海瑞罢官》一剧中“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文中写道：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姚文元文章所批判的《海瑞罢官》，是当时北京市副市长、著



名明史专家吴晗写的一个反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剧剧本。早在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在总结“大跃进”中“浮夸风”的经验教训时，许多人都谈到要提倡敢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赞扬了海瑞不惧权贵、刚正不阿的精神，提出要学习海瑞，宣传海瑞。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吴晗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的约请下，开始写全面评价海瑞的文章和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错误地对彭德怀开展批判后，毛泽东对上海会议关于要学习海瑞的讲话作了修改，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的问题，他认为彭德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1960年，吴晗写成《海瑞罢官》的剧本，主要描写海瑞任应天巡抚时除霸、“退田”的事迹。此剧1961年1月开始在北京上演。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单干风”（即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翻案风”（即纠正一部分干部、群众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所受到的错误处理）和“黑暗风”（实际上是对1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全国经济形势实事求是的而非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估计和报告），对中央一线领导在调整时期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表示不满。他还因此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新的解释和发挥，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并把这些观点上升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兴奋起来。她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对此，毛泽东开始时是不同意的。1964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有关。这些言论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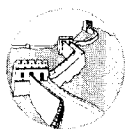
了毛泽东的判断，于是便“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①。显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矛头并不限于吴晗。从开始构思起，就是以某些中央领导同志为批判目标，要触及1962年甚至1959年以来党中央领导层内一些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这正如江青后来所说：“批判《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而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正因为如此，江青在上海组织的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江青后来说，之所以要对其他中央领导人保密，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因不知道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十多天后，除华东各省市报纸迅速转载外，北京和其他省市的报刊均未转载。文艺界、学术界一则不知其底细，二则畏其来势汹汹，大多以沉默的态度对待它。其他部门和领域里的人们，对几年来文学艺术领域中不断升级的过火批判已经习以为常，对此也未予重视。但没多久，学术理论界对姚文蛮横无理、无限上纲的普遍反感便反映出来，很多人投书报社表示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一些著名学者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对姚文的不满。

姚文发表之后，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十分震惊。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民盟负责人之一，又是中共党员，《文汇报》点名批判这样一位知名学者，为什么事先一点风也不向中宣部、北京市委透露？1965年上半年中央五人小组^②已经指示，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3页。

^② 这个小组是1964年下半年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经中共中央指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为组长，组员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



准。为什么姚文一下子就给吴晗、《海》剧戴上那样大的政治帽子？这样的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11月中旬，北京市委和《人民日报》等分别向上海方面了解情况，但却因江青、张春桥下令《文汇报》封锁消息而一无所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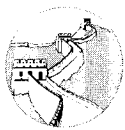
本来，姚文元未经任何中央主管部门，就点了一位知名学者、一位北京市负责人的名，并把问题说得耸人听闻，是不符合党的纪律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而且，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北京和其他各地报纸本来也没有一定要转载的义务。但是，那些有来头的发难者却为此大动肝火，他们立即添枝加叶地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11月20日，毛泽东要上海将姚文印成小册子，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在征订发行数时，北京新华书店征订购数很少。这样，在姚文发表十天内，由于江青、张春桥等的欺骗和挑拨，围绕着“转载”的问题，使毛泽东发展了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1月下旬，彭真由外地回到北京后，立即着手处理“转载”问题。他先后对《红旗》杂志和北京市委表示，关于发表批判吴晗文章的问题，中央报刊还要考虑一下再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了解文章发表的背景并几经讨论后，决定有条件地转载姚文。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根据彭真指示写成的编者按中指出：“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等等。11月30日，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人民日报》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中转载了姚文，这种安排本身就表明了不同意对《海》剧进行政治批判的意向。《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

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显然，编者按的基本倾向与江青等人借批判《海瑞罢官》作政治文章的意图是大相径庭的。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时也发表了少量批驳姚文元文章的稿件。无疑，北京方面的这种态度是很不合江青等人的口味的。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关锋等人的谈话中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认为它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要害”从“退田”变为“罢官”，仅仅两字之差，却使得《海》剧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大大增加了。对《海》剧的批判已经十分明显地与1959年庐山会议、与60年代初围绕着调整工作所产生的分歧联系起来，与对中央一线的不满联系起来。从更深处讲，它反映了党内、党中央内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从11月10日姚文的发表至12月21日，在40多天的时间里，北京方面对姚文的态度，使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认识。而且，“要害”升级之后，谁要是再像过去那样对批判《海》剧采取抵制或消极的态度，谁就会成为新的、更大的“要害”。

12月下旬后，由于点出了“要害”问题，进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1966年初，在文艺批评中搞牵强附会、唯心主义“影射学”的恶劣风气迅速蔓延，批判运动范围不断扩大。批判不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和文艺作品，而且扩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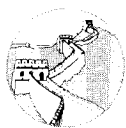
《二月提纲》

在批判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中，各方面都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纷纷报到了中宣部，要求指示、解决。当时，中宣部虽然不能摆脱“左”的影响，但与江青等人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希望尽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限制各种极左行为，控制运动的发展。1966年1月中旬，已经知道姚文背景的关锋、戚本禹先后把自己批《海》剧“政治要害”的文章交中宣部。中宣部要求他们改写，把批判的调门降低一点，但他们却态度强硬地拒不同意。中宣部只得将此事上报五人小组处理。在此期间，中宣部先后送了4篇有关文章的政治性提法的摘要上报请示，这就是后来《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扣压左派稿件”。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任何试图对恶性膨胀起来的极左思潮加以约束的努力，都有意无意地、间接间接地得罪了江青、张春桥这一伙“左”派。

对于这场政治批判，除上海市外，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都感到无所适从，迫切需要中央拿出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下一步的学术批判工作如何进行？如何处理运动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为了研究处理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彭真在发言中指出，经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海》剧与庐山会议并无联系，并否定了关锋等对邓拓的诬蔑。会议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左”的提法和词句，但主旨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

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提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二月提纲》虽然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去反驳“要害说”，但它却通篇不提“要害”二字，并用各种形式规定了运动的学术批判的性质和范围。《提纲》的这一中心思想，再一次给恶性膨胀起来的极左思潮以有力的限制，它也因此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不难想象，当时的运动如果是按照“提纲”的规定进行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在几个月之后爆发，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将不是对《海》剧的批判。

2月5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并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会后，“提纲”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因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提纲”于2月中旬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的文章。《提纲》的出现反映了当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运动迅猛发展时，党内和知识界相当多数同志所持的消极抵制态度，表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中央领导层受到抵制。《提纲》的发出使全国学术批判的形势有所缓和，“左”派无限上纲的文章被主管“压”下了，从政治上批“要害”的文章少了，从学



术思想角度进行讨论的成分增加了，文学艺术界又稍稍松了一口气。正如张春桥在几个月后所说，《提纲》的发出，“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很多文章不能发表”。

2月中旬以后，在贯彻、执行《提纲》的过程中，围绕着《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已从对《海》剧的批判转移到对《提纲》的否定，与《海》剧相联系的政治问题从彭德怀发展到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斗争的对象，从《海》剧、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这也就是说，《提纲》发出之后，江青等人的注意力已不在对《海》剧的批判，而在于由它所“暴露”出来的在中央出现的“修正主义”了。《提纲》的发出，成为矛盾升级、转换的关键，对《海》剧的批判，迅速、明确、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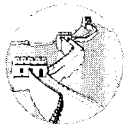
江青、张春桥等人从《提纲》中清楚地看到，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可能得到中央有关部门以至中央一线领导的支持。但是，《提纲》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毛泽东汇报后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张春桥等一时不知底细，不便立即发作，姚文元甚至已经根据《提纲》的精神为《文汇报》起草“四个月来运动总结”，作结束运动的准备了。当然，江青等人不情愿吞下这颗苦果，对于《提纲》中所说“学阀”、“以势压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话，他们更是耿耿于怀。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

1966年2月8日，当彭真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时，毛

泽东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但这并不表示他同意《提纲》的观点。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通过另一条途径，用另一份重要文件，实际上否定了《提纲》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966年2月2日至20日，得到林彪“完全支持”的江青，邀请部队四位政治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开得既仓促又奇特。会前，连解放军总政治部都不知道要座谈什么问题，无从作任何准备。会议名曰座谈，但既无日程安排，又没有固定的议题，每天的活动都由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座谈会往往是先看电影，边看边听江青发议论。所谓座谈会，其实是既无军职也无党政领导职务的江青，用林彪个人委托的名义谈她对文艺界形势的估量和对一些文艺作品的看法。会议第一天，她实际上针对《提纲》和当时对《海》剧的批判，对文艺方面的问题谈了一通看法：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尚未到来，等等。这些言论实际上就是此次江青召开座谈会的主题和基调。根据座谈内容整理的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30年代党领导的进步文艺的积极作用，极力抹煞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提出：“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以来文艺界中的修正主义”；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个座谈会纪要经毛



泽东审阅修改，并将《纪要》的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外，他还加写了诸如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等等。《纪要》还提出为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根据林彪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学习、检查的制度。《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并加按语说《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整个文艺战线。

《纪要》的形成，使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进一步发展为猛烈的政治运动。《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其严重性在于，它不仅整个地否定了建国后文艺界的成就，而且很快就成为“左”倾错误扩展到其他领域的突破口，为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的工作成绩，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炮制，是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互相利用，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开始。还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前，江青于1966年1月21日从上海到广州与林彪密商，得到林彪的“完全支持”。1月22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的指示中对在部队本来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说：“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很有经验，有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